

当代史学丛书

张岂之 主编

李颖科 著

俯视与沉思

——论中国史学传统

当代史学丛书 张岂之 主编 李颖科 著

俯视与沉思

——论中国史学传统

主编：张岂之

编委：余华清 杨健禧 黄新亚
葛承雍 汪玉凯 张晓豪
黄 伟 吴秉辉 韩 钊

当代史学丛书

俯 视 与 沉 思

——论中国史学传统

李颖科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13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0623-8/K·113

定价：3.15元

前 言

每当人们置身于波涛起伏、滚滚向前的世界历史长河之中，欣赏或凭吊辉煌灿烂的人类文化的时候，那璀璨光华的中国史学，尤其是古代史学，一定会使你拍手叫绝、流连不已，也一定会使你直接感触到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

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①中国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也说：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②也许人们还记得，1951年，印度亲善访华团团团长森德拉尔在访问中国时，曾高度赞扬中国古代史籍繁富。他说，印度由于缺乏自己的古史著作，以致在中学还要以中国的《大唐西域记》为教材。的确，在中国古代，那层出不穷的历史学家，灿若河汉的史学著作，种类繁多的史书体裁，严谨求实的编纂方法，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都是世界其他各国所不可企及的。

^①《历史哲学》第一部《东方世界》第一节《中国》，万有文库本。

^②《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界》。

那么，人们自然会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此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究竟有哪些传统？而在这些传统中，又有哪些是优良的？哪些是消极的？哪些一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绵延不绝？哪些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或者说是僵死的化石？

人们也自然会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史学传统中有哪些带有社会制度、历史条件等时代的斑斑印痕？又有哪些与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有着必然的联系？它与同时期的西方各国史学相比较又有什么异同？

也许有人还会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虽然很发达，但到近代却长期迟滞不前，始终不能跃入新的境地，这是否由于一些史学传统羁绊着中国史学前进的脚步，扼制着中国史学腾飞的双翼？

笔者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而走进中国已往的史学大观园的，如果读者有兴趣，那就让我们由此起步，共同作一次匆匆巡礼。这也许是一种美的享受。

序

本书是《当代史学》丛书之一种。

人类以自己的劳动开辟了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各种智慧的结晶，各种文化的表现形态，各种史剧的演出，都在这条长河中产生，而又构成她的支流，从而使这条长河的水源永不枯竭，使她的面貌日新月异。如果要问：世界上智慧的源泉是什么？我想，最简明的回答是：历史的长河。人类伟大的社会实践产生于历史的长河，而又使得这条长河更加美丽壮观；社会实践都是历史的，没有离开历史的社会实践。所以，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学科都可以归入于大写的“历史”之中。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遗产，自古以来就十分注意历史的记载和历史资料的保存。我国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悠久的、从未中断的中国历史及其丰富而深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足以引为自豪的硕果。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以及各个阶段都出现过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以首创的精神对人类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是一个巨大的宝

库。陕西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的远祖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少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曾在这里演出。陕西地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于人类历史长河，特别是其中国历史的伟大业绩，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和总结，采取实事求是态度，不要有偏见和成见，尽量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样肯定会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宝贵的历史经验的一些侧面，对近代中国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基本规律，对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毫无疑问，这可以振奋我们的精神，开阔我们的视野，坚定我们的信心，鼓舞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业。基于这样的需要，我们组织编写出版了《当代史学》丛书。以系列读物的形式，从社会经济、政治、风俗、思想、文化、艺术诸方面去研究史学（偏重于中国历史，但也要探讨世界历史）中亟待探讨的问题。我们十分希望这套丛书能有强烈的时代感，从而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职能，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还希望这套丛书能比较充分地利用陕西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着重研究周秦汉唐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当代史学》丛书主要发表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研究，具有科学价值的作品，热情扶植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

《当代史学》丛书除去强调思想性和学术性外，还要重视知识性和应用性；写作上要求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内容上要有史学知识的介绍，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能从书中获得应有的知识。

我希望这套丛书问世后，能够为读者同志们所喜爱；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愿意为她写稿，使她成为青年朋友们的良师益友。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衷心期待着史学界和读者同志们的热忱指教。

我想强调说明一点：本丛书能够出版，和陕西省政府、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 岂 之

1987年4月30日

目 录

序.....	张岂之 (1)
前 言	(1)
第一章 在历史真实画册的背后.....	(1)
一、彰善贬恶，不避强御.....	(2)
二、迂回坚韧，据实以书.....	(24)
三、心理性格与秉笔直书.....	(28)
第二章 强权统治与个人名利共同铸就的 历史悲剧.....	(32)
一、统治阶级的淫威与曲笔求全.....	(33)
二、个人名利与歪曲事实.....	(41)
三、一己之私利与任情褒贬.....	(44)
第三章 色彩斑斓的文学花毯 形象真实 的历史图案.....	(48)
一、生动——绘声绘色地叙述人物与 史事.....	(48)
二、准确——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的 真实.....	(62)
三、凝炼——简洁干练地表达丰富的 内容.....	(69)
四、回溯后的沉思.....	(76)

第四章 千古兴衰多少事 得失成败自有因.....	(79)
一、两条不同的行程.....	(79)
二、正统派的鉴戒史观：正人伦，叙纲常.....	(81)
三、透过表象的探求.....	(95)
四、异端派的鉴戒史观：直接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100)
第五章 主宰人类历史的是人还是神.....	(113)
一、不同史家之间“人事”“天神”的激烈争议.....	(113)
二、同一史家身上“人事”“天神”两种矛盾因素的共现.....	(136)
三、中、西方史学的反思.....	(146)
第六章 泰山不让土壤 河海不择细流.....	(156)
一、文献资料的采摭.....	(157)
二、口头资料的网罗.....	(163)
三、史籍的浩繁与博采的艰辛.....	(169)
第七章 真实的呼唤与求真的欲望.....	(173)
一、错谬牴牾，详加厘正.....	(174)
二、是非难决，疑以传疑.....	(184)
三、一种不容忽视的“滞后”现象.....	(190)
结 语.....	(199)

第一章 在历史真实画册的背后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
反封侯。”

——东汉童谣

如果对外中史学作一鸟瞰式巡礼，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史籍的真实性是世界其它各国所不可比拟的。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夏德在其《大秦国全录》中曾经指出：中国史籍虽然浩繁，但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都远为优越，而且比较可信。黑格尔亦认为中国历史著作具有精确性^①。可是，就在这真实的历史画册后面，有多少刚正不阿的史家身首异处，又有多少忠于职守的史家遭受贬黜。也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或者舍弃高官厚禄来向后人揭示历史的真实。他们虽然都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但是那种秉笔直书的高尚的史学品德却不失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的瑰宝。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

一、彰善贬恶，不避强御

I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是超然物外，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的秉笔直书的中正之士。而秉笔直书，就是要善恶必录，不允许史家带有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感性倾向。其目的在于把真实的历史传之后世，真正发挥史书的教诫作用。可想而知，这就难免要暴露统治阶级的丑恶之行，以违忤他们的意志而使得祸戮及身。“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①正是我国史家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的真实写照。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国史学自古以来就有直书求信的优良传统，中正不倚、秉笔直书的史家时有所现，他们坚定正直，峻节凜然，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为求历史之真实，别说饕餮不继，就是死难临头，也毫不介意。早在我国史学萌芽起步的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一些秉笔直书的谔谔之臣。晋国太史董狐、齐国太史南史氏便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古之良史。据《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周匡王六年），晋灵公恣意无道，欲害正卿赵盾，盾之族人赵穿为此杀灵公。董狐认为责在赵盾，于是公开直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

^①刘知几：《史通·直书》。

朝，致使权威赫赫的赵盾对他无可奈何。孔子盛称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杀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旋即为杼所杀。其弟继书而死者二人，后其弟又书，崔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毅然前往，得知已书，乃还。这种临危不惧、冒死以书的“实录”精神，为后世史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使我国古代史学一开始就闪烁着启人心智的火花。

如果说在奴隶社会操持政柄的奴隶主阶级是一个野蛮、残酷而愚昧的统治阶级，史家要秉笔直书，所面临的势必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那么到封建社会则更是如此。因为在封建社会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是一个更为粗暴专制的统治阶级，在他们身上充满了极其自私、肮脏、卑鄙无耻的东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一切都要以他们的意志这根指挥棒周转运行，所有的是非曲直都要在他们的意志这个审判案前予以审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任何逆向心理下产生的“不法”行为都将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遭到所谓法律的制裁。因此，在封建社会，每每是直道不彰，邪曲盛行，一切全无是非标准，“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东汉时期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这正是不平的社会现实在人们心理上造成压抑与愤懑的一种折射。不难想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史家要走上秉笔直书的康庄大道，将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特别是相对于欧洲各国，我国基于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优势，由国家集中管理的水利灌溉设施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从奴隶社会承袭下来的庞大的国家组织和官僚机构，因而便决定了在封建社会形成之初，即是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而欧洲各国却不然，由于自然经济的统治及其分散性，使它们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初期，政治上处于分裂割据、诸侯林立的混乱局面。勿庸置疑，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有利于抵制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的统一，推动农业、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但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严重地阻滞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这就人为地束缚住正直史家的手脚，给他们在如实地记载人类历史的道路上设置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羁绊和无法逾越的屏障。

在我国，继鏖兵喋血的战国而建立起来的大秦皇朝，是空前的封建专制王朝。集立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的秦始皇一开始就抓紧历史阵地为其统治服务。他以暴力的形式推行自己的主观愿望，焚《诗》、《书》、百家语和一切非秦国所记的历史。这充分表明在秦始皇时期，史学跟政治联系的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而这种联系的实质正是史学绝对受制于强权统治。到了汉代，统治阶级对学术思想的控制更为严格。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的石渠阁奏议和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奏议,正是汉代以皇权专制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学术思想的标志,宣、章二帝先后以皇帝兼宗师、教主的姿态来强化学术统治的要求。试想,在这种绝对君主专制、“凡有利于君主者均有法律效力”的强权社会,史家要书法不隐,善恶必录,将是何等不易之事。然而,霜雪交下,方见贞松之操,忠实于历史的责任感使许多操履忠正,具有雪松劲柏之节的史家临危不惧,敢于在强权统治面前挥起公正无私的笔“唯直”而不“唯上”。被称为我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认为,史学应该求是存真,他撰《史记》,坚决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没其真”^①的作法,要求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整部《史记》对于历史事实的叙述,正是以此为准则。以汉初近百年的历史为例,司马迁首先记载了它的繁荣与强盛,在《平准书》中指出:

“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诸如此类的颂词还散见于《史记》其它各篇，如“民务稼穡，衣食滋殖”，“海内殷富，兴于礼义”，“人民乐业”等等，枚不胜数。可是，司马迁并不就此住笔，而是进而揭露当代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当人们正在热衷于吹捧武帝的丰功伟绩，高唱国泰民安赞歌的时候，司马迁却用自己的笔锋大胆地暴露西汉王朝统治的严重危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武帝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德，连年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另一方面耗费大量金钱来搞封禅、求仙和巡游的勾当。结果是“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中外骚扰而相奉”，“财赂衰耗而不赡”^①，“贫民流徙”，“国家用竭，海内萧然”，到处是一派凄凉残破的景象。同时，人民不断反抗，“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②不难看出，《史记》不仅写到当代，而且敢于据事直书，特别是对当今皇上的丑恶之行，亦照样进行无情的揭露抨击。正因为这一点，《史记》向来以“实录”、“信史”著称。

II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更把史学作为维护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酷吏列传》。

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自曹魏始端，终南朝梁、陈，历朝都设置史官撰修国史。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是一个交相叠印的历史阶段，朝代更替频繁，政治斗争激烈，撰史在政治上是件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统治阶级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每每要求史家粉饰太平，隐恶扬善，使他们的所谓“美名”流芳千古。在这种强权统治的淫威震慑之下，史家当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随人俯仰，曲笔求全；要么中正不倚，直书受讥。忠实于历史的器识使一些史家毅然择取后者，坚持秉笔直书的立场。

三国吴韦昭撰《吴书》，帝孙皓欲为其父和作本纪，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入列传，于是结恨孙皓，“渐见责怒”^①。南朝宋范曄撰《后汉书》，“立论持平，褒贬允当”，凡《三国志》曲解回护之事，范曄一律将其改正过来，恢复历史的真相。清代赵翼对此评价甚高，他指出：

“范蔚宗（范曄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此史家正法也。”^②

的确如此，在《后汉书》中，凡属刚正清廉之士，

①《三国志·孙皓传》。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